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全球化的强化可能大于弱化

——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G20杭州峰会是我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充分展示了中国积极维护和拓展经济全球化成果的决心。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TPP、TTIP等排他性区域化出现，全球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对此，本报就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关系、逆全球化表现以及全球化走向等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 本报记者　史小今

学习时报：2016年被一些人称为是全球化开始逆转的一年。我曾读过您的《历史的惯性》一书，在这本书中，您预测了英国脱欧这一事件，并认为区域一体化将会倒退。请问，您觉得区域一体化倒退是否标志着全球化的逆转，区域化与全球化是什么样的关系？

阎学通：长期以来，自由主义学派将区域化说成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我则认为区域化是对全球化的反动。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自然趋势，是跨国公司利用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政策的差别，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有效配置的生产布局，这对各国政府控制本国经济主权构成冲击。为减少全球化给各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各国政府通过区域化扩大参与国的市场规模来应对全球化的冲击。区域化本质上是对域内国家开放，对域外国家封闭，这不过是扩大地理范围的保护主义政策。比如欧盟，其目的就是要扩大经济边界，从而抵御全球化的压力和冲击。在一个国家靠本国市场的力量无法抵御全球化冲击的时候，依靠国家联合，将市场边界做大，在区域内部实行人、财、物的自由流通，对区域外则仍然是保护主义，也就是说，是保护主义更大范围的使用。通过这个手段来抵御全球化的影响。因此，我的观点是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反动，是阻止全球化发展的力量。

此次英国脱欧，其本质是欧洲区域一体化的倒退，而不是全球化的逆转。同时区域化倒退也不意味全球化逆转，而是意味全球化的负面作用比以前强大了。我在《历史的惯性》中预测英国会脱欧，是基于英国民众认为借助欧盟的区域化来应对全球化的冲击是无力的，因此他们想收回让渡给欧盟的主权，自行抵抗全球化的冲击。至于这种退出欧盟的方式是否有利于英国经济的发展，目前还很难判断。在全球化趋势下，究竟是依靠本国力量单干有利，还是联合其他国家集体合作应对有利？我个人觉得，应对全球化的策略成败不取决于方式的选择，而取决于国家本身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大国对区域化的需求小于中小国家。中美印利用自主的经济主权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效果较好，但这不意味着中小国家利用这一策略也能奏效。无论中小国家采取收回主权的策略还是向地区合作组织让渡更多主权的策略，都阻止不了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即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相似性将进一步增强。

学习时报：区域化弱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果说全球化只会强化不会弱化，那么是否意味着未来区域化将会持续弱化呢？

阎学通：区域一体化弱化的原因主要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地区经济组织未能有效地帮助成员国摆脱经济困境。希腊可能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使得人们怀疑参与地区经济合作的意义。特别是当美国、中国、印度这些严守货币主权的国家能较快摆脱经济危机后，这使得人们重新审视参加区域一体化策略是有利还是不利。英国摆脱这场经济危机快于其他欧盟成员的原因，被大众认为是英国没加入欧元区而保留了英镑，希腊无力摆脱困境与其没有货币发行权相关。英国受中东难民困扰相对较小被认为是因为没有参加申根协定，而开放边界的欧盟成员则受冲击较大。拉美、非洲、中东和东亚的区域化水平低于欧洲，原因各有不同，但一个共同原因是这些地区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国推动区域化。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地区大国推动区域化的领导能力更弱了，因此区域化停滞不前或有所倒退。

今后五年，区域化弱化的可能性大，而全球化则可能是进一步强化，更加重视主权将成为趋势，国家向地区组织让渡主权变得更加谨慎。欧盟一体化将是倒退趋势，会有更多的成员进行公投，决定是否留在欧盟，特别是关于是否继续使用欧元和是否继续执行相互开放边界的协定。欧盟的经验促使其他地区的国家在合作时更加谨慎让渡主权。

学习时报：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全球化的逆转趋势？

阎学通：我认为有三种情况。一是大国之间采取相互隔离政策，即全面相互遏制政策。像冷战期间一样，政治经济各方面都隔离；二是再次发生世界大战，相互实行制裁和封锁，这就会使全球化发生逆转；三是出现计划经济成为大国的主导经济体制，采取封闭式的发展模式。冷战后全球化加速的两大动力其一为市场化：很多国家采取了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其二则是东西方两个市场的融合。在上述三个情景不发生的条件下全球化出现逆转的可能性就很小。

学习时报：一直以来，对待全球化都有两种声音，有的人认为全球化是好事，有的人则极力反对全球化。您的意见呢？

阎学通：我们国家对全球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冷战结束初期，国内很多人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只看到了全球化不好的一面，后来这些声音逐渐消失。到了9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颂扬全球化的声音，认为全球化代表了进步的未来。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比较极端，不客观。全球化本身具有双刃剑作用，正面作用很多，如扩大市场、促进资金流通、降低交易成本等等，其负面作用也很多，最为突出的有三方面。一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危机很容易快速扩散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且持续时间较长。二是加剧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的两极分化。国际上，富国会越来越少，穷国会越来越多。G20成员国占了全世界GDP的85%以上，贸易的80%以上。也就是说G20所代表的国家之外的150多个国家还占不到全世界GDP的15%和贸易的20%。由此可以看到当今世界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这是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在国内，由于全球化为跨国公司提供了进行跨国投资的便利，导致在全球范围内国家内部阶层固化的速度加快。三是削弱了主权国家的能力。全球化导致一些跨国公司十分强大，有些跨国公司一家的财力相当于十几个国家的财富总和，这就导致一些小国的政府无力对抗跨国公司，维护不了本国小企业的利益。随着全球化的加深，今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冲击会更大，而不会更小。

我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此可总结参与全球化受益的经验。另一方面还可总结在区域化过程中美国和德国的经验，他们是区域化的受益者。不开车就没有车祸危险，但永远无法快速前进。防范全球化负面影响也是同理。我国需要不断摸索如何在不断加大开放的前提下防范全球化危害的方法，而不能学英国走回头路的做法，更不能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李克强总理在今年联大会上向全世界承诺中国将更加开放，这为我国应对全球化冲击指明了正确方向。

学习时报：在未来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阎学通：从经济角度讲，资源在全球范围进行有效配置是全球化的核心内容，而有能力这样做的行为体是跨国公司而不是政府。今后，我国的跨国公司是否会比以往更大力度地进行跨国经营，特别是进行跨国投资，决定了我国对全球化推动作用的大小。我国的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因此我国国有企业在全球范围的投资增幅大小决定了我国对全球化的促进作用。

从国际政治角度讲，今后五年国际经济增长得快慢主要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是第一大经济增长发动机（GDP增量世界第一）。如果我国对外贸易持续负增长，GDP增速不断下滑，世界经济就难以向好。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利于促进全球化，而低增长则不利于全球化。

有人建议在全球化过程中我国应推动建立共同体，我认为，今后十年之内，东亚共同体和亚太共同体都不太可能建立起来，建立更大地理范围的共同体则在本世纪也是不可能。共同体的建立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同时参与国得看到共同体给他们带来好处，才能建立起共同体。现实情况下，东亚国家之间缺乏足够的共同经济利益，日本不愿让中国独掌地区合作领导权，中美在东亚区域化的领导权问题上也是竞争关系而非合作关系，因此东亚地区合作水平低于世界其他地区，离建立共同体的目标还很远。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存在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TPP和RECP的竞争是具体表现。亚太范围建立共同体比东亚困难更大。要在全球范围建立共同体，其难度就更不用说了。

学习时报：目前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现象，我们应该怎么看？如何应对？

阎学通：这些现象的出现也反映了全球化的力量非常强大。全球化导致国内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当前的民族主义核心就是要求政府收回主权，少参加地区合作以维护本国的利益；民粹主义则是要求政府缩小两极分化的贫富差距。这些问题，只能由各国政府自行解决。因为，现在的国际体系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体系，国际组织的能力还非常弱。尽管国际组织数量上万，但它们的作用却小于近200个主权国家。与此同时，主权国家应对社会问题的能力基本上限于一国之内，对于一国境外的影响力有限。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政府，都无力治理他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问题，因此最可取的政策就是治理本国的问题。对于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有能力制定国际贸易规范的国家可以做这方面的努力，对于无力制定国际贸易规范的国家，只能采取自保政策。

战略视角

全球宏观政策协调为何重要？

——从美联储“用嘴”加息冲击世界经济谈起



□ 王家强

2016年9月5日，在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的闭幕致辞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总结G20杭州峰会取得的五大成果时，将全球宏观政策协调共识放在了第一位，“我们要继续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和协调……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运用好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等多种有效政策工具，向国际社会传递二十国集团成员共促全球经济增长的信号”。这是G20峰会在全球政策协调上取得的又一次新突破。

全球性的宏观政策协调步入常态化

全球性政策协调步入常态化，政策协调外延也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扩大到结构性政策，以及其他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层面。

全球性的宏观政策协调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的历史现象，此前主要是发达国家大国之间的事（如七国集团G7、欧盟等）。2008年雷曼倒闭后，全球金融市场哀鸿一片，随后迅速波及实体经济。当年10月开始，在美国的召集之下，包括G7国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全球主要央行都同步降息、加大流动性支持。这是首次全球一致性的政策行动。紧接着，2008年11月G20华盛顿峰会召开，会议由此前的财长与央行参加升级为首脑会议，全球政策协调走上台前。随着G20峰会目标从危机应对逐步转向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有效治理，全球性政策协调步入常态化，政策协调外延也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扩大到结构性政策，以及其他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层面，包括促进包容性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恐怖主义威胁等议题。

全球宏观政策协调为何如此重要？我们可以先从过去几年来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对全世界的影响有个感性、局部的认识。美联储实施多年的零利率和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以来，美国经济呈现了相对稳健的复苏态势。2014年10月，美联储宣布结束第三轮量化宽松（QE3），开始规划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路径。然而，美联储的政策转向迅速引起全世界的“不良反应”。在持续的讨论“加息”议程的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经历了多轮的金融波动和资本流出，特别以2015年下半年以来大规模的资本流出为甚。显然，基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美联储的一举一动都产生了强烈的外溢效应。在美联储宽松政策期间新兴市场普遍遭遇了流动性泛滥、信贷猛增和泡沫积累的冲击，而在美联储政策退出期间，新兴市场资本外流、货币贬值不断。如何加强世界各国与美联储政策的沟通，如何通过协调将美联储政策变化带来的外溢影响降至最低，以及如何约束美联储过于“纸上谈兵”“光说不练”的前瞻性政策指引行为，成为全球货币政策协调的一大难题。在全球高度一体化的时代，美联储仅仅“动嘴”，就在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惊涛骇浪，加强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全球宏观政策协调外延不断扩展

全球宏观政策不断加强沟通和协调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这与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加深、全球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变迁等都有紧密联系。

事实上，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外延在不断扩展，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再到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监管政策等，都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协商。全球宏观政策不断加强沟通和协调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原因很复杂，这与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加深、全球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变迁等都有紧密联系。

第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加深，宏观政策外溢效应与溢回效应加大，迫切要求主要的大型经济体开展政策协调。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逐渐加深。如今，绝大部分国家都处于全球化生产的一个价值链条之上，例如中东、非洲扮演着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的供应基地角色，亚太地区担当了主要的生产与制造工厂职能，美欧国家主要处于研发设计与消费市场的终端。在这个链条上，任何环节发生重要的变故都会对整个循环链条产生影响，主要经济体任何政策变化都会对全球产生较大的外溢影响。以2011年7月发生在泰国的洪灾为例，灾害不但给当地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冲击了全球汽车、电子、电器及零部件等多个行业的供应链。泰国虽然在全球科技产业链中不占据枢纽地位，但这一事件表明，随着全球化分工的细化，每个国家的产业发展都在全球出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更别说美国、欧元区、中国等如此大型的经济体，在政策上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会对全球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并又通过外部环境的变动带来明显的溢回效应，伤及自身。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实证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再平衡，通过贸易、大宗商品价格和金融市场三个渠道，对主要贸易伙伴都带来了溢出效应。例如，在东南亚，中国经济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GDP要下降0.2到0.5个百分点。

第二，全球经济面临结构性难题，复苏艰难，需要世界各国制定政策，共同应对。过去几年，全球经济持续疲软复苏，即便在如此宽松的环境下也是这样，这表明实体经济已经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一是科技进步迟缓。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衰减，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二是人口结构变化。主要经济体先后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社会成本与压力增大。三是去全球化趋势。各国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四是金融监管问题。危机后，全球金融监管改革虽有进展，但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却受到了一定抑制，而高杠杆、高泡沫等风险在积累。五是安全挑战，自然灾害、地缘政治、恐怖主义和社会动荡等事件此起彼伏，不断威胁经济增长环境。没有各国合作、共同制定政策和推动实施，是难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第三，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承担全球责任力不从心，需要各国合作打造更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过去，在美欧国家经济实力占主导、相对稳定发展的时代，美联储可以担当世界央行的功能，美国和欧元区的宏观政策实施，就可以对全世界产生较好的调控作用。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欧洲更是遭遇欧债危机的冲击低迷不振；与此同时，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例已经从2005年的47%上升到2015年的58%。目前，美元和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依然占据80%以上份额的主导地位，与自身经济实力日益不相称。而我们看到的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更多地只关注国内经济而难以兼顾国际责任，欧洲央行为应对欧洲经济更是自顾不暇。因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重建有效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呼声迭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G20集团迅速站到了国际合作的中央舞台，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着手开展治理机制改革；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启航，2016年10月正式加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等新的合作机制建立。

未来，以G20为主要平台的全球性宏观政策协调将会成为常态。全球性宏观政策协调包括很多层面，原则上要求各国量力而行、共进共退，任何搭便车的行为都可能导致政策协调目标走偏。G20杭州峰会首次将结构性政策与财政、货币政策共同纳入协调范畴，扩大了政策协调的外延。当前全球政策协调的主要着力点包括：一是货币政策，应在保持价格稳定的基础上，继续支持经济活动。这意味着，在全球经贸活动依然低迷的形势下，有扩大宽松空间的国家不应过早收紧货币政策。对美国而言，如果价格水平依然较低、经济增长尚未强劲，实施加息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同时，各国还应合作维护汇率的稳定，防范过度波动，避免竞争性贬值，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二是财政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对促进实现共同增长目标非常重要。有财政空间的国家应当实施推动增长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特别是优先支持高质量的投资；财政空间较小的国家应当控制好收支结构，确保债务比例占GDP的水平保持在可持续水平，防范主权债务风险。三是结构性政策。各国应当协同深化结构性改革力度，包括在就业市场、产业政策、监管政策等各方面，提升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此外，各国还应一致抵制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维护公平、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

世界经济